

第
8
辑

天一閣文叢

天一閣博物館◎編

TIANYIPAVILIONSERIES

浙江古籍出版社

天一閣

天一閣博物館 編

第 8 輯



浙江古籍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天一阁文丛. 第8辑 / 天一阁博物馆编. —杭州:
浙江古籍出版社, 2010.9
ISBN 978-7-80715-595-9

I. ①天… II. ①天… III. ①藏书楼—文集 IV.
①G258.83—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174230号

天一阁文丛(第8辑)

天一阁博物馆 编

出版发行 浙江古籍出版社
社 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
责任编辑 钱之江 屈笃仕
封面设计 姜寻工作室
激光照排 浙江时代出版服务有限公司
印 刷 浙江新华印刷技术有限公司
开 本 787mm×1092mm 1/16
印 张 16.75
字 数 300千字
版 次 2010年9月第1版
印 次 2010年9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80715-595-9
定 价 30.00元
网 址 www.zjguji.com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目 录

考证

- 扬州徽商江春及其受命为四库馆征书考述(下) 郑伟章(001)
- 黄裳所藏天一阁藏书考 李开升(015)
- 日本国会图书馆藏万斯同《新乐府词》全祖望手校本及其流变考 方祖猷(027)
- 从《洋烟考述》谈对姚燮的再认识 袁 慧(033)
- 陕西省图书馆馆藏古籍中的名家藏本 郎 菁(042)
- 桐乡现存若干谱牒管窥 俞尚曦(050)
- 《曝书杂记》与钱泰吉的藏书 陈 娜(055)

论说

- 从“书藏二酉”到“万卷藏书”
——《中国旧书文化史》札记 徐 雁(065)
- 海源阁宋本“四经四史”叙录 丁延峰(080)
- 关于域外所藏中国古文献的若干思考 陈东辉(092)
- 《伏跗室善本书目》校注 骆兆平(100)
- 铁琴铜剑楼的书法文献收藏 仲伟行(120)
- 明代嘉兴私家藏书特色浅析 沈红梅 刘永刚(125)
- 故乡乡土情结
——天一阁藏书文化的一个重要原点 施祖青(134)
- “求书”文化史与文化解释
——中国藏书文化史研究的一种新视角 何关峰(139)

人物

- 夏承焘与冯孟颀 饶国庆(148)

变风变雅,朱印蓝印

——四明藏书家陈寥士事迹稽略 李 军(154)

海天云树忆良涛

——自《墨海楼校书图》说起 唐 微(161)

张宗祥铁如意馆 郑闳辉(165)

新文学版本第一藏书家唐弢 谢振声(171)

探索

传统终结的重大演进和最后辉煌

——嘉业藏书楼私家藏书文化新析(下) 陶 济(177)

《新刊古列女传》版本源流及陕图藏本递藏渊源 杨居让(185)

明州吉祥院的“宋版一切经”与日本平泉佛教文化 李广志(190)

阮元校勘学成就探赜

——以《论语校勘记》为例 倪梁鸣(194)

关注

谈谈傅璇琮先生赠书的价值 袁芳芳(202)

析天一阁新书库设计理念 王宏星(205)

观点

甬宋楼空的背后

——从《陆纯伯文稿》看陆树藩保护甬宋楼藏书所做的努力

及对售书的评价

..... 顾志兴(211)

鉴赏

《书林掇英》整理后记 李雄飞(218)

一部近代宁波城厢社会简史

——快活老叟著《宁波闲话》评介 应方舟(225)

随笔

老蠹鱼随笔 沈 津(232)

明清藏书楼随录	来新夏(241)
藏书史两题:关于纸的另类说法	袁 逸(247)
张爱玲家族的宋版书官司	周慧惠(253)
编后语	编 者(258)

扬州徽商江春及其受命为 四库馆征书考述(下)*

郑伟章

四、江氏主持扬州风雅及养士

扬州盐务富商,竞尚奢丽,“昏嫁丧葬,堂室饮食,衣服舆马,动辄费数十万。有某姓者,每食,庖人备席十数类,临食时夫妇并坐堂上,侍者抬席置于前,自茶面荤素等色,凡不食者摇其颐,侍者审色则更易其他类”。“其先以安绿村(笔者按:即安岐)为最盛。其后起之家,更有足异者,有欲以万金一时费去者,门下客以金尽买金箔,载至金山塔上,向风飏之,顷刻而散,沿草树间,不可收复”^[1]。

高宗曾有过禁绝扬州富商这种奢靡之风的念头,但因这些富商能以余财养士和从事一些文化公益活动,也莫可奈何。他在一首诗中说:“富庶从来说广陵,满城丝管映街灯。唐风拟令崇淳约,谋食贫人虑失凭。”并加注云:“商人习为侈靡,其技巧役之,贫民借以糊口者甚众,亦损有余补不足之道。若如唐、魏俭啬,则土著盖难于谋食,故不之禁。”^[2]又有另一首诗云:“三月烟花古所云,扬州自昔管弦纷。还淳拟欲申明禁,虑碍翻殃谋食群。”亦加注云:“常谓富商大贾出有余以补不足,而技艺者流,借以谋食,所益良多。使禁其繁华歌舞,亦诚易事,而丰财者但知日蓄,岂能强取之,以贍贫民?且非王道所宜也。化民移俗,言之易而行之难,率皆类此。”^[3]

扬州确有一些富商,如江春,并不“声色狗马”,而是除以有余效劳“国家大典礼、大徭役”外,还以大量的资金来附会风雅,结诗社,文宴修禊,结纳文士,或在家中养士,使许多贫困之士“借以谋食,所益良多”。

闻名全国的冶春诗社,发起者是清初大文豪王士禛。他字贻上,号阮亭,别署渔洋山

* 郑伟章先生力作《扬州徽商江春及其受命为四库馆征书考述》上半部分已于《天一阁文丛》(第7辑)发表,本期继续刊发下半部分,使成完璧,以飨同好。

人,卒后谥号文简,山东新城人,顺治十二年进士,官至刑部尚书。顺治十六年官扬州府推官,在扬州发起冶春诗社,曾两度修禊虹桥,“昼了公事,夜结词人”,“结纳遍天下”,与一时名流如吴伟业、冒襄、徐钊、宋荦等游宴无虚日。实际上,在他之前就有孔尚任等已开其端。

在他之后,山东德州人卢见曾曾在扬州两任转运使,也是上接渔洋,文采风流,“日与诗人相酬咏,一时文宴盛于江南”。他曾于乾隆二十二年发起虹桥修禊,咏七言律诗四首。其中一首云:“重来修禊四经年,孰识虹桥顿改前。潋汉畅交零雨后,浮图高插绮云巅。雕栏曲曲生香雾,嫩柳纷纷拂画船。二十景中谁最胜,熙春台上月初圆。”^[4](按:此处熙春台似即江春后来所建东园之熙春堂。)其时,和修禊韵者七千余人,编次得三百余卷^[5]。“座中皆天下士,而贫而工诗者,无不折节下交”,如戴震、惠栋、严长明、朱稻孙、郑燮、高凤翰、钱谷、金兆燕等,真个是“虹桥修禊客题诗,传是扬州极盛时”^[6]。

孔、王、卢开风气之先,扬州盐商学习模仿于后。如居扬州新城东关街枝上村之马曰琯,字秋玉,号嶰谷,扬州盐商,“好学博古,考校文艺”。“高宗南巡时亦两赐御书”,“尝入祝圣母万寿于慈宁宫,荷丰貂宫纁之赐,归里以诗自娱,所与游皆当世名家。四方之士过之,适馆授餐,终身无倦色。著有《沙河逸老诗集》”。国图尚有其《沙河逸老小稿》,卷二有《题江鹤亭黄芍药》诗云:“芦帘半展映初阳,一种翻阶额上妆。二十四桥名品在,熨开双眼看鹅黄。”其弟曰璐,字佩兮,号半查,工诗,与兄齐名,称扬州二马,举博学鸿词不就,有《南斋集》。二马曾有韩江雅集之会,与会者有程梦星、厉鹗、王藻、全祖望、赵昱、丁敬、杭世骏、方世举等近三十人。其中厉鹗字太鸿,号樊榭,杭州人,工诗词及元人散曲,举博学鸿词,主马氏家最久,年六十无子,马氏为之割宅蓄婢。后卒于乡,马氏为位于行庵以祭之。所著有《辽史拾遗》、《宋诗纪事》、《樊榭山房集》等^[7]。以上二马及厉鹗事均可见拙著《文献家通考》上册第265至268页及第210至211页。

马氏兄弟之后,主持扬州风雅者即江春、江昉兄弟也。李保泰云:“方伯以次为商总,昆弟先皆自为师友,与当代之文人学士往来流寓于扬者,延接唱酬无虚日。方伯以雄伟英杰之才……为当事倚重,上膺帝眷,出则砥砺奉公,入则握管拈韵,诗酒高会,有云霞气谊之盛。”^[8]吴锡麒云:“往时广陵风雅之盛,则有马氏嶰谷、半查昆仲,开设坛坫,号召宾客”,“马氏既衰,乃有江君鹤亭起而承之。其弟橙里辅而翼之,一时翰苑之前辈,南北往来之士大夫,莫不编纁杂投,觞咏交作,推襟送抱,申旦忘疲。余亦数游扬州,独与橙里相昵近……然两人敦友如之,好此唱彼和,金春而玉应,余未尝不得寓目焉。故它事不及知,至于诗未有余知之深者也。”^[9]袁枚云:江春“性尤好客,招集名流酒赋琴歌,不申旦不止”。“身歿之日,家无余财,人以比古之樊靡卿^[10]、陈孟公^[11]一流,而风雅过之”^[12]。阮元云,江春“主持淮南风雅,与卢转运见曾同意趣。水南花墅别业开并蒂芍药,转运就公宴

赏赋诗。转运北归,至召伯埭舟中赋诗始别。北郊铁佛寺,荒寒多红叶,公数招杭太史世骏诸诗老,清斋赋诗终日。三十一年十二月十九日,为苏文忠七百岁生日,与诸诗人悬像于小山僧之寒香馆赋诗,一时文人士,如钱司寇陈群、曹学士仁虎、蒋编修士铨、金寿门农、陈授衣章、郑板桥燮、黄北垞裕、戴东原震、沈学士大成、江云溪立、吴杉亭烺、金棕亭兆燕,或结缟纻,或致馆餐,卑节虚怀,人乐与游,风亭月榭,觞咏无废,与玲珑山馆马氏相埒”^[13]。

关于水南花墅别业已见前所述。请卢见曾等人赋诗,李斗记载了年份,他说:“乾隆己卯(二十四年),芍药开并蒂一枝,庚辰(二十五年)开并蒂十二枝,枝皆五色,卢转使之为绘图征诗,钱尚书陈群为之题袭香轩扁,自著有《水南花墅吟稿》。”^[14]在《随月读书楼集》卷中,尚有江春《己卯仲夏,奉和卢雅雨都转题水南花墅并蒂芍药原韵四首》,第一首句云:“野墅即今多雨露,一茎幻出两花来。”第三首句云:“从此读书兼读画,扬州花月十分新。”还有《庚辰夏,水南花墅复开并蒂芍药十二枝,雅雨都转重过宴赏,即席赋呈四首》,第二首云:“扬州遍地是楼台,芍圃重重亦并开。一朵双花随意数,刚从二十四桥来。”

关于铁佛寺修禊是在二十六年(辛巳)。江春有诗,题目为《辛巳谷雨日,招同杭董浦、郑板桥、汪石恬、陈汉皋、李于亭、费苕溪、常菜畦、黄北垞游铁佛寺,分赋得篠字》,云:“何年沦为寺,于兹奉三宝。铁佛至今传,钟磬破昏晓。我来偶眺望,喜无尘俗扰。墙外多古松,神骨露张璪。”^[15]江昉亦有诗,题为《腊八日,鹤亭五兄重修铁佛寺成,同人分韵。寺为杨行密故宅》可知因江春捐资修该寺成,故办此会。关于苏文忠“七百岁生日之会”,苏文忠即宋代苏轼,字子瞻,建中靖国元年(1101年)卒于常州,年六十六,生年当为宋仁宗景祐三年(1037年),至南宋高宗赵构时始谥号为文忠(按:至乾隆三十一年,当为苏轼七百三十岁生日,阮元记为七百岁,误)。

李斗于《画舫录》还附载了一篇精彩游记,专记辛卯(三十六年)七月初六至初八日,江氏邀请客人与舟子共二十二人,游览江园之怡性堂、涵虚阁、天光云影楼,及乘舟白天黑夜游湖。在舟中,或对弈,或旁观,或言故事,或歌或舞,“箫声于于”,好不自在。^[16]

李斗还记载了扬州诗文之会景况,云:“至会期,于园中各设一案,上置笔二,墨一,端研一,水注一,笺纸四,诗韵一,茶壶一,碗一,果盒、茶食盒各一。诗成即发刻,三日内尚可改易重刻,出日遍送城中矣。每会,酒肴俱极珍美。一日共诗成矣,请听曲……红灯千盏,男女乐各一部,俱十五六岁妙年也……诗牌以象牙为之,方半寸,每人分得数十字或百数字,凑集成诗。”^[17]

又江昉“所居紫玲珑阁,名士之至扬州者,无不纳履。兴化任进士,陈晋斋之师也,任公子侍御大椿,与公以经术品行行为友;天台齐侍御召南为诸生,在敷文书院,与公亦以学长;钱大昕、厉鹗、嘉兴王谷原,多主其家,湖舫山舆,联吟觅句,殆无虚日。宾至则下榻拂

几,卷轴丝竹,情赏靡缺,故尔时文讌之盛,称二江公家”。“公状端凝,性仁厚,周急无德色。诗人方介亭和有所陷,公委曲用心,以厚赏免之;汪雪礪本贫不能出户,公济以服食,共吟咏,荐于鹤亭。公余事类此不胜记”^[18]。在江春、江昉的诗作中,与杭世骏、戴震、黄裕、金兆燕、陈撰、沈大成、江立等人交游、送别之诗甚多,此不赘。

据《欽事闲谭》卷八江藩云:“江春、江昉歿后,江振鸿亦延接名流,座客常满,如方子云、钮非石、袁寿阶、吴兰雪、郭频迦,皆下榻康山,极一时文酒之盛。自君亡后,邗上无风雅总持之人矣。”许承尧按云:“彼时吾县盐商,富几敌国,穷奢极欲,文叔(即江振鸿)乃淡静至此,品格弥可贵也。”

李斗云:“方伯死,泣拜于门不言姓氏者,日十数人。或比之陈孟公之流,非其伦也。”“江氏世族繁衍,名流代出,坛坫无虚日,奇才之士,座中常满,亦一时之盛也。”这是说他家中所养“奇才之士”之多。《画舫录》亦详载了与江家关系密切及所养士六十余人的情况。

学者:阮元,字芸台,号伯元,仪征人,可谓乾嘉道时期学界泰斗,是江春、江昉的外孙。江春、江昉的一位堂姐嫁到了阮家,是阮元的祖母。故阮元“敬闻吾父述二公之事详矣”,乃撰《江鹤亭橙里二公合传》,为文集外之佚文;王步青,江春师事之;沈大成,字学子,号沃田,松江华亭人,“通经史百家之书”,馆于江氏,歿后,江氏为之刻《学福斋诗文集》;吴献可,太仓人,吴梅村之孙,“通经史,究名法之学”,江春“延于家二十年”;金兆燕,字钟樾,号棕亭,全椒人,进士,官至国子监博士,尤精元人散曲。入京供职三年后归扬州,遂馆于江氏康山草堂;蒋宗海,字星岩,号春农,丹徒人,乾隆十七年进士,官至军机处行走。年仅四十即乞养里居,后尝主扬州梅花书院及江氏秋声馆。

工诗词者:江立、江安父子;江兰、江苾兄弟及子侄江士相;江昱;林道源,江春之表甥,“旧时为盐务水巡”,居江园十年;黄裕,字北垞,江都人,著《金竹居诗存》;陈撰,字玉几,号楞山,鄞县人,工诗,有《玉几诗集》三卷,晚年无子,江春“为筑寿藏南屏之阳”,女婿许滨“画入神品”亦同馆于江春家;徐麟趾,字荔村,工诗,晚居江氏康山草堂;陆飞;汪舸,字可舟,歙县人,为江氏“校定《山谷集》并《山中白云词》”;李肇辅;乔伸怀;杨维新;马文坛;尤其是方贞观,字南塘,桐城人,江春“延之学诗字,寓秋声馆二十年,论诗多补益,有小行楷《唐诗》二十帙,方伯刊之于石”等。

诗书画兼通者:江炳炎;熊之勋,字清来,江宁人,工诗善书,与江春为亲戚,“常居康山草堂”;罗士珏,字庭珠,号雪香,江春之内侄,亦工诗善书,搜罗古帖极富;黄溱,字正川,号山隴,扬州人,画法方洵远,与项佩鱼齐名;徐柱,工画;能擘窠书者有江士钰、马文坛;施安,善隶书,为江春书写“随月读书楼”额;康焘,“书法尤精,年七十能作蝇头小楷”;程兆熊,字孟飞,号香南,仪征人,不仅工诗词,其“画笔与华岳齐名,书法为退翁所赏,扬州名

园、甲第、榜署、屏障、金石、碑版之文，皆赖之”，“晚居随月读书楼”，子程法，书法亦得其家传；精于篆隶者有黄树谷、黄易父子；陈起文；鲍元标工小楷书；常执桓，善章草；黄大笙，能作反字，又左手临孙过庭《书谱》，且精音律。

工金石、刻石、刻印及精鉴别者：江恂“收藏金石书画甲于江南”；其子江德量，也“好金石，尽阅两汉以上石刻，故其隶书卓然成家”；江士珏“精于刻石”，“常于山中悬崖下临万丈，于崖壁上刻方丈大字”；吴猷可之子吴完夫“工镌印，琢砚极奇巧之技”；汪舸之子汪大杰，字中也，号雪疆，“鉴赏古画及铜玉器，得秘法”。

医者：赵鸿远，苏州人，“能治奇疾”；汪彦超，“亦精于医”；李钧，“精仲景法”，江春延治族人伤寒，霍然而愈。

善工程、园艺、技巧者：谷丽成，苏州人，“精宫室之制，凡内府装修由两淮制造者，图样尺寸，皆出其手”；潘承烈，字蔚谷，“亦精宫室装修之制，而画得董巨天趣”；文起，字鸿举，江都人，“精于工程做法，所见古器极多”；汪大黉，字斗张，号损之，歙县人，“精于制自鸣钟”；江晟，字聿亭，号平西，“晚年与安琴斋制车轮辘”，“称巧构，名平安车”；吴履黄，徽县人，江春之亲戚，“善培植花木，能于寸土小盆中养梅，数十年而花繁如锦”。

得力助手：叶天赐，字孔章，号韵亭，仪征人，工诗书，广交游。江春“治事多资之。尝随方伯议公事某所，众胁方伯将作花押，天赐栗阶夺笔摔之。众问为何如人，鹵莽至此。叶大呼曰：‘吾啖江之饭，所以报之者在此时也。’江亦出门去，事赖以不失。”寿腹公，号菊士，会稽人，江春总办东巡时，差任其事。时朱孝纯守泰安，事多繁剧，寿腹公为之谋划，朱深服其才。^[19]

五、江春培养戏班

高宗皇帝爱热闹，爱看戏，爱排场。“华祝迎恩为八景之一，自高桥起至迎恩亭止，两岸排列档子。淮南北三十总商分工派段，恭设香亭，奏乐演戏，迎銮于此。”^[20]高宗亦有诗句云：“夹岸排当实厌闹，殷勤难却众诚殚。却从耕织图前过，衣食攸关为喜看。”^[21]在乾隆四十五年那次南巡，御舟至镇江“相距约十余里，遥望岸上，着大桃一枚，硕大无朋，颜色红翠可爱。御舟将近，忽烟火大发，光焰四射，蛇掣霞腾，几眩人目。俄顷之间，机訇然开裂，则机内剧场中峙，上有数百人，方演《寿山福海》新戏”^[22]。

为了适应迎銮的需要，江春也不甘后人，培养了两个戏班子。“天宁寺本官商士民祝釐之地”，“殿前盖松棚为戏台，演仙佛麟凤太平击壤之戏，谓之大戏”，重宁寺亦构大戏台。“两淮盐务例蓄花、雅两部，以备大戏。雅部即昆山腔；花部为京腔、秦腔、弋阳腔、梆子腔、罗罗腔、二簧调，统谓之乱弹。昆腔之胜，始于商人徐尚志征苏州名优，为老徐班；而

黄元德、张大安、汪启源、程谦德各有班；洪充实为大洪班；江广达为德音班，复征花部为春台班，自是，德音为内江班，春台为外江班；今内江班归洪箴远，外江班隶于罗荣泰。此皆谓之内班，所以备演大戏也。”^[23]

养戏班、排戏都是要花钱的，比如当年，“淮商排《桃花扇》一剧，费至十六万金之多，可谓侈矣”^[24]。江春凭借自己雄厚的经济实力，从其他戏班大量挖掘演员人才。李斗在《画舫录》中也有所记载，如：

程（谦德）班中的正生石涌塘，“学陈云九风月一派，后入江班，与朱治东演《狮吼记》、《梳粧》、《跪池》，风流绝世”；小旦杨二观，“上海人，美姿容，时人呼之为水蜜桃。家殷富，好串小旦，后由程班入江班”；老旦王景山，“眇一目，上场用假眼睛如真眼，后归江班”。

徐（尚志）班旧人半入洪（充实）班，而洪班之人又多人江班。朱文元，“为程伊先之徒，演《邯郸梦》全本，始终不懈。先在徐班，至洪班则名声鹊起……遂归德音班。文元去后，洪班遂无老生。不得已，以张（大安）班人代之。及江班起，更聘刘彩亮入班，彩亮为君美子，以《醉菩提》全本得名。而江鹤亭嫌其吃字，终以不得文元为憾。及文元罢府班来，鹤亭喜甚。乃舟甫抵岸，猝暴卒”；小生李文益，“丰姿绰约，冰雪聪明，演《西楼记》于叔夜，宛似大家子弟，后在苏州集秀班，与小旦王喜增串《紫钗记》、《阳关折柳》，情致缠绵，令人欲泣，后入江班”；吴端怡“态度幽闲，得其文静处，至《人兽关·掘藏》一出，端怡之外无人矣，入张（大安）班，继入江班”；小旦余绍美，“满面皆麻，见者都忘其丑”。金德辉“步其后尘，不相上下，后入德音班”。“江班，亦洪班旧人，名曰德音班”；“江鹤亭爱余维琛风度，令之总管老班。常谓人曰：老班有三通人，吴大有、董抡标、余维琛也”；大面王炳文，“说白身段酷似马文观”。二面姚瑞芝、沈东标齐名，称国工。赵云崧（翼）《瓠北集》中有《康山席上赠歌者王炳文、沈东标七言古诗》。大面范松年，“为周德敷之徒，尽得其叫跳之技，工《水浒传》评话，声音容貌，模写殆尽。后得啸技，其啸必先敛之，然后发之。敛之气沉，发乃气足，始作惊人之音，绕于屋梁，经久不散。散而为一溪秋水，层波如梯，如是又久之，长韵嘹亮不可遏，而为一声长啸，至其终也，仍嚶嚶然作洞穴声。中年入德音班。演《铁勒奴盖于》一部，有周德敷再世之目”；四川魏三儿，号长生，“年四十来郡城投江鹤亭，演戏一出，赠以千金”。

“郡城自江鹤亭征本地乱弹，名春台，为外江班，不能自立门户，乃征聘四方名旦如苏州杨八官、安庆郝天秀之类。而杨、郝复采长生之秦腔，并京腔中之尤者，如《滚楼》、《抱孩子》、《卖饽饽》、《送枕头》之类。于是春台班合京、秦二腔矣。”郝天秀，字晓岚，“柔媚动人，人以坑死人呼之，赵云崧有《坑死人歌》”；杨八官，长洲人，“作盛夏妇人私室宴息，迫于强暴和尚，几为所污，谓之打盂饭”。

关于丑角，所扮拙妇呆男、商贾刁赖，使闻者绝倒，然终囿于“土音乡谈”，不能致远。

“惟京师科诤皆官话,故丑以京腔为最。广东刘八,工文词,好驰马,因赴京兆试,流落京师,成小丑绝技。近今春台聘刘八入班,本班小丑效之,风气渐改。”而扬州“本地乱弹小丑,然终止于土音乡谈,取悦于乡人而已,终不能通官话”^[25]。

此外,江春还适应扬州画舫歌船的需要,聘请清唱歌手、串客、四弦手等人才于家。当时,李啸村有诗咏唱扬州画舫歌舞盛况云:“天高月上玉绳低,酒碧灯红夹两堤。一串歌喉风动水,轻舟围住画桥西。”苏州张九思,“精熟九宫,三弦为第一手,小喉咙最佳,江鹤亭延之于家”;“扬州清唱既盛,串客乃兴,王山霭、江鹤亭二家最胜;又,朱三工四弦,江鹤亭招之入康山草堂。”^[26]

关于戏班后场之鼓乐器具,李斗云:“后场一曰场面,以鼓为首。鼓板此技徐班朱念一为最,声如撒米,如白雨点,如裂帛破竹,后入洪班。其徒季保官左手击鼓,右手按板,技如其师,归江班”;江班又有孙顺龙,洪班有王念芳、戴秋朗,皆以鼓板著名;笛子此技许松如为最,“次之戴秋闾最著,庄有龄以细腻胜,郁起英以雄浑胜,皆入江班”。

关于戏具行头,“此之谓江湖行头。盐务自制戏具,谓之内班行头;自老徐班全本《琵琶记》、《请郎花烛》,则用红全堂,《风木余恨》则用白全堂,备极其盛;他如大张班《长生殿》用黄全堂;小程班《三国志》用绿虫全堂;……若今之大洪、春台两班,则聚众美而大备矣”^[27]。

关于曲谱。程志猷,字载勋,“家巨富,好词曲,所录工尺曲谱十数橱,大半为世上不传之本。凡名优至扬,无不争欲识,有生曲不谙工尺者,就而问之。子泽,字丽文,工于诗,而工尺四声之学,尤习其家传”。“程载勋亦老且贫,曲本亦渐散失。德音班诸工尺,汪损之尝求得录之,不传之调,往往而有也。”^[28]

关于剧本。高宗一次次南巡,推动了扬州戏曲事业的发展,为适应这种发展,乾隆四十二年(丁酉),“巡盐御史伊龄阿奉旨于扬州设局,修改曲剧,经历图思阿并伊公两任,凡四年事竣”^[29]。当时所设名曰词曲局。总校为黄文旸,字时若,号秋平,工诗古文词,其诗清越高洁。壮年奔走齐鲁吴越间,及返里,运使曾燠招入题襟馆中,与时流相唱和。^[30]所著有《古金通考》六卷、《隐怪丛书》十二卷、《通史发凡》三十卷、《扫垢山房诗钞》十二卷等。所整理之剧本为《曲海》二十卷,黄文旸序目云:“乾隆辛丑(四十六年)间,奉旨修改古今词曲。予受盐使者聘,得与修改之列,兼总校苏州织造进呈词曲,因得尽阅古今杂剧传奇。阅一年事竣。追忆其盛,拟将古今作者各撮其关目大概,勒成一书。既成,为总目一卷,以记其人之姓氏。”^[31]另一总校为李经。分校为凌廷堪、程枚、陈治、荆汝为等。这次所整理之曲剧中,元人杂剧 100 种,元人传奇 2 种附江氏德音班所演《伏虎缘》1 种;明人杂剧 63 种,其中有康海撰《中山狼》,明人传奇 258 种;清人杂剧 56 种,清人传奇 496 种,共 976 种,但《扬州画舫录》卷五载为 1013 种。因此目载焦循《曲考》,有所增益,如增

杂剧 42 种、传奇 26 种,及前所未备者 20 种。^[32]

关于梨园总局。当时,于扬州城内苏唱街老郎堂设梨园总局,管理各家戏班及演出事宜等。李斗云:“每一班入城,先于老郎堂祷祀,谓之挂牌;次于司徒庙演唱,谓之挂衣。每团班在中元节,散班在竹醉日。团班之人苏州呼当戏蚂蚁,吾乡呼为班揽头。梨园以副末开场,为领班。副末以下老生、正生、老外、大面、二面、三面七人,谓之男脚色;老旦、正旦、小旦、贴旦四人,谓之女脚色;打诨一人,谓之杂。此江湖十二脚色,元院本旧制也。苏州脚色优劣,以戏钱多寡为差,有七两三钱、六两四钱、五两二钱、四两八钱、三两六钱之分。内班脚色皆七两三钱,人数之多,至百数十人,此一时之胜也。”^[33]

乾嘉年间,扬州的戏曲事业在中国戏剧史上有很高的历史地位。而江春所培养的德音班(内江班)、春台班(外江班)在推动戏曲事业的发展方面,功不可没,在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影响。如,江苏淮剧、浙江婺剧、江西赣剧、四川川剧、湖南湘剧、云南滇剧、广东粤剧、广西桂剧、安徽黄梅戏和庐剧、皖南花鼓等,都多少受到春台班即外江班的影响。在岭南,也流传外江戏,广东《外江梨园会馆碑记》、《梨园会馆上会碑记》记载了春台班及其他八种徽班名称。后来,海外华侨还将外江班剧种传到了泰国、菲律宾、缅甸、印尼、马来西亚、毛里求斯等国。乾隆五十五年高宗八旬万寿庆诞,春台班在京师甚为活跃。嘉庆八年后四大徽班进京,其中之一就是春台班。徐珂曰:“其时,徽班有四:四喜、三庆、和春、春台是也”,“又谓四喜、三庆、春台、嵩祝为四大徽班者”。“于春台曰孩子,以其诸郎皆夭夭少好也”。“嘉庆庚辰(二十五年),春台无故散去,七月,仁宗崩”^[34]。这些虽都是发生在江春逝世以后的事,但是与他艰难缔造德音班、春台班的开创之功是分不开的,他为中国戏剧事业所作出的贡献是客观的存在。

六、敕令各地督抚加强四库馆征书力度时,清高宗又想起了江广达

清高宗在乾隆年间开设四库全书馆,征书天下,是从三十七年正月初四日给直省督抚、学政发布征书之谕开始的。他在谕中强调,读书要“得其要领”,“多识前言往行”,必须“蒐罗益广,则研究愈精”,因此他在“御极之初,即诏中外搜访遗书”,并命儒臣校刊、纂修各种书籍。现内府藏书“插架不为不富,然古今来著作之手无虑数千百家”,“正宜及时采集,汇送京师,以彰稽古右文之盛。其令直省督抚会同学政等,通飭所属,加意购访”。并在谕中明确了哪些书可蒐,哪些书“毋庸采取”,或购或借钞,将所采集之各书取列目录,汇齐朝廷,经检核,“有堪备览者,再开单行知取进”^[35]。

出乎高宗意料之外,此谕发出去之后,并未引起各地督抚的重视。十个月过去了,仅收到贵州巡抚觉罗图思德于十月初三的奏折,称贵州“凤号荒徼,人文卑陋”,征集不到书

籍。全国一本书也未征集到。他原想,谕旨发出后,各地“一闻稽古右文之诏”,“当无不踊跃争先”,“有求必应”。没想到是这种“阅时既久,哀集无闻”的结果。于是,他又于十月十七日发出第二道谕旨,指出头道谕旨发出后,“迄今几及匝岁,曾未见一人将书名录奏,饬办殊为延缓”。他批评了一种错误思想,“或疑陈编故册,非如民生国计为刻不容缓之图,因以奉行具文,徒致往返迟滞”,“甚非所以体朕念典勤求之至意也”。看来这种轻视“陈编故册”,排斥于“民生国计”之外的思想,历代皆有。高宗命令各督抚、学政“速行设法访求,无论刊本、钞本,一一汇收备采”,“仍将现在作何办定章程及有无购得若干部之处,先行据实奏复”^[36]。

在高宗严饬之下,各地才缓缓开始动作。到翌年二月,各地征书情况:山东 21 种,直隶 4 种,山西 8 种,湖北 5 种,河南 18 种,江西 40 余种,浙江 56 种,安徽 22 种,江苏 22 种,奉天 4 种,陕西 40 种,广东 8 种,福建、湖南、广东、云南均为零种。他曾让大学士刘统勋传谕给河南巡抚何燠,“令其再悉心蒐采,并饬属实力奉行,不得以书籍无关政要,一任了草塞责”。第二道谕旨发出后,各地督抚仍未把征书工作放到应有的高度。

到翌年三月十八日,高宗气急败坏,发出第三道征书谕旨,严厉批评说:“乃各省奏到书单寥寥无几”,“此必督抚等视为具文,地方官亦第奉行故事,所谓上以实求,而下以名应,殊未体朕殷殷咨访之意。且此事并非难办,尚尔率略若此,其他尚可问乎?”命令“着再传谕各督抚等,予以半年之限,即遵朕旨,实力速为妥办”,“若再似从前因循搪塞,惟该督抚是问”^[37]。可以说,四库馆征书天下,在全国范围内实际行动起来,是在发出此谕大加强力度,给督抚们施以高压之后才真正开始的。

在发出这道严旨的第二天,为了切实加强征书力度,高宗还给主政藏书最富、文化最发达的地区的两江总督高晋、江苏巡抚萨载、浙江巡抚三宝等发出专门谕旨,提出一些征书的具体对象和办法,要求“务即恪遵朕旨,实力购觅,并当举一反三,迅速设法妥办,以副朕殷殷伫望之意”,并四百里加急传谕之。^[38]

这次征书,高宗已经历过四次南巡,对江浙一带藏书家情况、书肆书贾书船等情况都了如指掌。同样,对每次南巡来回都要驻蹕的扬州的藏书情况,他心中也有一本账。过去,他曾向进京晋见的两淮盐运使面谕:“江广达人老成,可与咨商。”这次征书天下,其心急切,其意殷殷,他再次想起了广达号盐务总商“江广达”江春。他在闰三月初三以三百里加急传谕两淮盐政李质颖,云:“至淮扬系东南都会,闻商中人颇有购觅古书善本弄藏者,而马姓家蓄书更富,凡唐宋时秘册遗文,多能裒辑存贮,其中宜有可观。若能设法借抄副本呈送,于四库所储,实有裨益。李质颖系翰林出身,于典籍气味尚近,且现为盐政,查办尤易为力。止须派总商内晓事之人,如江广达,令其因亲及友,广为访借,不必假手吏胥,更可致滋扰。着传谕李质颖,即遵旨妥办,查访藏书内流传已少及现在并未通行各

书,向其家借出缮录副本呈送,其原书速行给还。务期裒集精良,多多益善。”^[39]

高宗所指的“马姓”藏书家,即前已述及的在扬州举办韩江雅集诗会的著名盐商马曰琯、马曰璐兄弟。兄弟俩互为师友,嗜书有同癖,家有小玲珑山馆、丛书楼,藏书百柜,见古本秘籍必重价购之,或世人所愿见者,不惜千百金付梓,曾以数万金购得传是楼徐氏、曝书亭朱氏藏书,经书贾钱景开之父介绍还购买了述古堂钱氏之书,所藏达十余万卷。又尝请人至翰林院抄写《永乐大典》及抄书于宁波天一阁。马氏又喜刻书,如朱彝尊《经义考》,及许氏《说文》和《玉篇》、《广韵》、《字鉴》等书,时人谓之“马板”书。至征书时,二人均已故世。曰琯之子马裕,字元益,号话山。曰璐之子马振伯,有《纪畬堂小稿》。

在两淮盐政李质颖奉谕之前,两江总督高晋即已令扬州知府陈用敷查访马家藏书;奉谕之后,李质颖“当即选派晓事总商江广达等八人,令其因亲及友,广为访借,务期必得,以多为贵”。马裕被传谕到盐政府署“宣示德音”,即“欣喜踊跃”,“将书目呈出”,全目共1385种藏书。马氏表示,“受皇上培养深恩,沦肌浹髓。今蒙购访遗书,商人家里所藏,苟有可采,得以仰邀睿览已为非分之荣,何敢复烦抄缮,致需时日,只求将原书呈进,便是十分之幸了”,其言词诚切,出自实心。李质颖于闰三月二十日奏折向高宗汇报情况并送上所选的291种书籍^[40]。

闰三月二十八日,高宗寄谕两江总督高晋、江苏巡抚萨载、两淮盐政李质颖,一是令两江总督高晋将从马裕家“查借书籍”,一律“着归还李质颖一处汇办”;一是阅看了呈上的马裕家所选书单,“多系近代人诗文等集,其于古书、善本尚不概见”,产生了疑问,“马裕家夙称善于收藏,何所存仅止于此”,怀疑是否“单外另有佳本”^[41],于是,李质颖、江春等又“将马裕书目复加拣择”,挑选出另一批394种,专差呈送。^[42]四月十九日,李质颖奏折云,经过多次挑选,从马裕家挑选书籍共计776种,书目中剩下的609种,“俱系通行共见之书,无可再加采选”。针对高宗心存的疑虑,李氏云:“奴才恐其或有善本另藏,未尝载入目内者。亦经详细密访。据各商总咸称:马裕为人小心谨饬,今所送之书目,乃其家因卷帙繁多,虑其遗失,逐一登明,以便查考,系伊家原有之藏书私账,所以纤细不遗,俱开在内。江广达等闲时常到其家,曾见此书目。”“合之众商总之言,亦属确情,似无别有秘藏之事。”^[43]这才打消了高宗的疑虑,马氏一家才得安宁。

据三十九年八月初一日李质颖所上奏折云,两淮盐政除三次奏进马氏藏书776种外,又选“晓事总商”江春等八人,“令其因亲及友,广为访觅,并向书贾广行购取。据该商等将觅得书籍陆续拣送来署,臣随到随阅,将流传尚少之书开单进呈五次,共送过九百三十二种”。两项相加,共计1708种^[44]。据统计资料,这次四库馆征书,在高宗亲自过问和施压下,终于取得了巨大成效,各省进呈之书共计12237种,其中江浙两省为最多,江苏4808种,浙江4600种,几乎占全国征书量的80%。江苏省4808种中,包括苏州书局1726种、

江宁书局 1374 种、两淮盐政 1708 种。两淮盐政所征书仅比素称藏书之乡的苏州少 18 种,超过江浙两省之外的任何一个省所征进之书。^[45]可见,高宗在四库馆征书中加压时,想起江广达,让他协助两淮盐政征书,确实是卓有成效,取得了可观的实绩。

扬州马氏在私家献书中居第一位。前四位的数据为:马裕 776 种,鲍士恭 626 种,范懋柱 602 种,汪启淑 524 种。^[46]《四库全书总目》著录马氏所献书 375 种,5529 卷。为奖励马氏献书之功,朝廷奖给其家《古今图书集成》一部,共 5200 卷,520 匣,敬谨珍藏,供奉正厅。又赐平定伊犁御制诗三十二咏,平定金川御制诗十六咏,并得胜图三十二幅。又在马氏所上最佳之本《鹖冠子》上高宗题诗曰:“铁器原归厚德将,杂刑匪独老和黄。朱评陆注同因显,柳谤韩誉两不妨。完帙幸存书著楚,失篇却胜代称唐。帝常师处王友处,戒合书绅识弗忘。”^[47]江春有《挽马半查(曰璐)先生》诗两首。其一云:“少微入夜陨沙河,把卷无人咏涧阿。前辈余君嗟又丧,西州掩泪忍重过。等身著作传江左,当代辞征让大科。地下还应续风雅,骚坛牛耳主盟多。”其二云:“蒐书特诏下金泥,山馆储藏次第赍。锦帙牙签供乙览,龙翔凤翥待宸题(原注:先生所进书籍,御题《鹖冠子》一章,此希世之殊荣也)。曾搔白发三千丈,来蹶康山十二梯(原注:余近辑康山先生见过惠诗)。我欲重披高士传,先生真与古人齐。”^[48]

江春不但协助征书,他自家亦略有藏书。阮元云,江春“喜吟咏,好藏书,广结纳”^[49],阮氏仅提及而已,未详其藏书具体情况。袁枚云:“邗江地当冲要,公卿士大夫下至百工伎艺,得珍怪之物及法书名画,无不纵纵然,屡及公门,如龙鱼之趋大壑。公一与申纳周旋,必副其意使去。以故宾从借公起家者无虑数十辈,而公转屡空。”^[50]可知江氏藏书及法书名画甚富,惜无详载,今仅能从一鳞半爪中寻其踪迹。

前已提及,沈初游康山时所咏诗,又有句云:“风流故事说当年,地志新收御府编(原注:康山载入《钦定古今图书集成》,主人书列堂楣)”^[51]。似其家亦藏《古今图书集成》一套。陈征芝《带经堂书目》卷一有江氏所藏元代元统年间刊本《周易会通》。周星诒批注云:“江,见《扬州画舫录》,扬州巨商也,收藏极富,《湖海诗传》、《随园诗话》俱载其诗。”先哲一点一滴之注脚,亦能烛照后人,我据此批注才寻到袁、王对江春诗的评语。又藏有日本物茂卿所著《七经孟子考文补遗》。按,陈增撰《月墀遗稿》有《周松霭师昙花馆所藏日本国人松贞文元泰〈古梅园墨谱〉歌》,其第二首诗云:“长崎馆外海云稠,造墨人还隔九州。今日优昙花下见,胜他随月读书楼。”(原注:“扬州江氏楼名,楼藏日本国人所著《七经孟子考文补遗》。”^[52])《四库全书总目》著录“两淮江广达藏书”一种,为宋代唐慎微撰《证类本草》三十卷,曾经宋晁公武《郡斋读书志》、陈振孙《直斋书录解題》著录。^[53]他还延请郭尚文“管理文汇阁所藏书籍”,说明文汇阁曾委托他管理。

古籍文献中,关于江氏藏书虽无系统记载,但亦时不时有所触及,现缕述如次: